

跨界合作编目的探索与实践

□ 赖雪梅 / 图书馆报 北京 100037

摘要: 编目的社会化已经无所不在,遍地开花,从某种程度上说,强调编目的专业化其实是拒绝其社会化的托词。专业化只是基础,社会化才是目的,专业化服务于社会化,反过来,社会化又会促进其进一步专业化,二者绝不冲突。

关键词: 图书馆,出版社,联合编目,跨界编目,共建共享

DOI: 10.3772/j.issn.1673-2286.2010.11.011

随着馆配市场的兴起与繁荣,出版发行界,特别是馆配商,开始为图书馆提供MARC数据。这些数据被称为采访数据,或者毛坯数据,图书馆基本不用这些数据进行编目。往往,他们宁可牺牲时效性,也要等到样书在手,重新录入一遍,以保证编目数据的专业性。

正因为此,很多新书到馆半年甚至一年多,都不能上架提供借阅服务,究其原因还是数据还未编好。

近年来,出版发行界与图书馆界沟通与交流较为频繁,很多馆配商的数据都是委托相关图书馆来进行编制的,因此数据的质量大幅提高,使上述情况得到了改善。

传统的联合编目指的是一组各自独立的图书馆开展的书目原始编目的协作活动,成员馆之间有义务相互提供书目记录”。而在互联网环境下,传统编目的外延已经扩大了。以中国的编目中心为例,都吸收企业会员参加,这些企业会员很多都来自出版发行界,他们同样有责任和义务上传和下载书目数

据。也就是说,现在的联合编目已经不仅仅是图书馆之间的书目协作活动。

甚至,在出版发行界,还产生了以编目为主的专门机构,它们与图书馆及其联编中心,开展了更加广泛和深入的合作。

由此观之,编目的社会化是大势所趋,已经和即将对传统联合编目带来影响,联合编目工作将面临重大的机遇和挑战。

1 编目工作的新环境新变化

全球最大的图书馆美国国会图书馆(LC)的书目控制未来工作组2007年11月30日发布了《书目控制未来报告》,指出:“书目控制未来将是合作的、去中心化的、国际范围的、基于Web的。它的实现将出现在与私营机构的合作、与图书馆用户的积极协作中。数据将从不同来源获取,变化将迅速出现,书目控制将是动态的而非静态的。”

1.1 编目人员青黄不接

《书目控制未来报告》表明,近30年来,由于套录成为普遍现象,人们一直觉得对编目专业人员的需求会下降。而现在则面临编目员的大量退休,有素质的教学人员也变得稀缺。

在国内同样如此。一个熟练的编目人员的工作量是每天套录数据40条,原编20条。由于编目人员有限,大量的工作都要求加班完成。现在国家规定,加班必须付给双倍以上的工资。图书馆是全额财政拨款,几乎没有加班经费,因此,绝大多数编目人员都不愿意加班,数据生产速度非常缓慢。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支付上传编目数据的成本是3元,而以国家图书馆为例,制作一条数据的各项成本将近20元。相比而言,套录数据会比原编数据节省很多经费。因此,国家图书馆也期望其他成员馆加大原编数据的上传力度。但抛开技术能力不谈,仅从成本来考虑,中小成

员馆明显缺乏生产和上传原编数据的动力。因此,想在图书馆业内解决这一问题基本是不可能的,编目工作必须前移,回到出版商、馆配商、数据提供商那里,跨业书目协作与共享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显得更加迫切。

《书目控制未来报告》认为,具有高效平衡上游出版商及数据商的能力对于图书馆来讲是非常关键的。图书馆界面临的最重要问题之一就是:为包含印刷品和数字资源在内的馆藏,找出更加有效和快捷的方式来实现编目和元数据的制作。

报告认为,图书馆的元数据环境太复杂,检索协议环境也很复杂,建议开发一个更灵活可扩展的元数据载体,兼容Web技术与标准,不限于图书馆数据工作实践,这似乎吹响了抛弃MARC的号角。

OCLC的副总裁Lorcan Dempsey是LC书目控制未来工作组成员,在工作组的报告草案发布不久,他立刻在网站上发起了一个名为“新一代编目”的试验计划,抓取来自出版商的ONIX数据并对质量加以强化,以及早加入全球最大的书目数据库——OCLC在线编目联合目录WorldCat。显然,OCLC将由用户贡献数据的分销商转而成为原始数据提供商。

1.2 出版元数据取得重大进展

国内方面,出版元数据相关标准取得了重大进展,为图书馆界与出版界的书目协作提供了更加便利的条件。《出版物物流二维码》标准将于年底实施。目前,《中文图书标识数据》正在人民文学、商

务、科学和高教等中央级出版社进行应用。

我国于1994年开始将一维条码用于出版物出版。与一维条码相比,图书二维码信息容量会更大,由于可携带出版物的基础描述性信息,因此可以完全不依赖数据库而单独使用。图书二维码的应用,可规范图书产品基本信息的描述内容,达到图书属性信息与实物的同步。国家图书馆中文图书采编部副主任王洋说,如果出版物元数据能够规范图书出版的信息,确保图书标识性数据能够得以实现,则图书出版信息将与图书同时面世。如果借助二维码将其物化在图书上,在图书流通过程中,只需要一个解码器即可通过二维码获取图书的信息,不再需要重复做图书目录。图书馆作为终端用户,也只需要添加图书馆有特殊要求的内容即可,著录性工作可以节省,大大节约了社会成本。

二维码应用试验的事实说明,人们对出版信息化建设的认识有了很大提高,看到了改进书目工作对加强物流管理与降低发行成本的重要作用。从源头上解决书目制作的问题,不仅对发行商、图书馆界是莫大的福音,对出版社自身也必将增加信息技术附加值,带来无限商机。

1.3 社会编目网站不断涌现

近年来,社会化编目网站大量涌现,其中,较著名的是创建于2005年8月的LibraryThing。国内像书业数据交换中心、豆瓣网(douban.com)都具有类似功能。这些网站提供很多Web 2.0的功能,

如对图书评级、发表评论、加标签,以及各种来源的MARC记录。他们认为:“每个人都是图书馆员,公共编目也是不错的编目。”

2 编目的困境与机遇

2.1 编目的专业化与社会化

目前,全国有五大编目系统:以国家图书馆为主的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以北京大学图书馆为主的CALIS联机合作编目中心、以深圳图书馆为主的地方馆文献联合采编协作网、中科院国家科学图书馆联机联合编目系统和上海市文献联合编目中心。

很多图书馆同时是这五家编目中心的成员馆,成员馆依托编目中心上传和下载数据。一般来说,下载数据的价格远低于上传数据的价格,而一些成员馆为了追逐利润,增加上传数据量。但这些数据往往都不是他们自己编制的,而是从馆配商那里获取的免费数据,或者是从网上甚至是从其他编目中心下载的数据。这些数据要么大量重复,要么离编目界所认可的MARC数据相距甚远。

编目的社会化已经无所不在,遍地开花,从某种程度上说,强调编目的专业化其实是拒绝其社会化的托词。

2.2 文献信息学视野下的馆、社、店工作

读者是馆、社、店赖以生存的基础,其阅读行为的变化从根本上影响着馆、社、店的发展,“读者第一,用户至上”应该成为馆、

社、店共同的服务理念。馆、社、店应该在合作编目、数字出版上加强合作。面对编目和数字出版,图书馆要发挥自己在专业和技术方面的优势,出版发行界也不能够一味等待。

2.3 跨界编目的理想模式

近几年来,出版发行界在书目网络的建立方面有了长足的发展。图书馆界与出版发行界的合作编目,资源共建共享已经初露端倪。跨界编目的好处有三:第一,可以通过网络使图书馆、出版社、书商之间信息流顺畅,避免重复建设;第二,可以优势互补,形成合力;第三,可以为出版发行界创造更多的经济效益。跨界书目协作与共享的理想模式是,由一家馆配商第一时间从出版社那里获取全部的新书信息,加工成MARC数据,提供给一家编目中心,制作成编目数据,然后各成员馆共享。

3 跨界合作编目的未来

3.1 图书馆与出版社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

图书馆与出版社,作为书业的上游和下游,有着天然的血缘联系。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与图书馆界长达百余年的互助与合作更是出版史和图书馆史上的佳话。

我国现代出版社与现代图书馆先后诞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旗下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作为中国最早的两家出版社,为我国现代图书馆事业的

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1927年7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函授学校设图书馆学科。1928年,商务印书馆开办暑期图书馆讲习班,由东方图书馆(涵芬楼)邀请全国大中学校及公私立图书馆,各选派一人,赴该馆听讲并实习5周。王云五、陈友松、沈丹尼等主讲图书馆及其他应用技术。实习指导则由东方图书馆职员担任,受训者达146人。1930年第二次开办,实习学员有200余人。

著名出版家、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曾长期担任中华图书馆协会执行委员,代表作有《中外图书统一分类法》,在图书馆界影响深远。1929~1937年,在他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策划推出了1721种、总计共4000册的《万有文库》,“使得任何一个个人或者家庭乃至新建的图书馆,都可以通过最经济、最系统的方式,方便地建立其基本收藏”。这一番雄心壮志,被美国《纽约时报》称赞为“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不是子弹”。

新中国建立后,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旗下新华书店总店作为全国图书的总发单位,依托《新华书目报》的书目征订功能,为全国各级各类图书馆和新华书店采购图书提供了有力保障。《新华书目报》事实上承担了“中国可供书目”的职能,是图书馆界不可或缺的工具报。

3.2 OCLC的实践

早在2006年11月12日,OCLC的WorldCat就启用了9位数的记录号,意味着它的第1亿条记录的诞生。OCLC创建于1967年,成立之

初,其名称为“俄亥俄高校图书馆中心(Ohio College Library Center)协作网”。1971年,引进今天被世界各地图书馆广泛使用的在线图书馆编目共享系统,使得图书馆编目成本大大降低。1977年,它扩展成为全美图书馆合作网络。1981年,它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国际图书馆合作组织。OCLC伴随着书目数据新格式MARC的诞生而诞生,随着MARC的发展而发展。目前,OCLC已拥有112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6万所会员图书馆和超过10亿条馆藏数据,全年营收可达2亿多美元。

OCLC的NetLibrary还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子书供应机构,先后有775家出版社提供17万种西文电子书,包括电子听书6000多种,每月增加2500种新书。

OCLC的馆藏分析服务可以为图书馆调整采访方针提供重要的依据,OCLC还于2007年7月推出一项名为Publisher Collection Analysis(出版商收集分析)的新服务,此服务针对与图书馆有业务往来的出版商。“出版商收集分析”使出版商通过WorldCat获取采购该出版商出版物的图书馆的馆藏信息,图书馆也能通过FirstSearch获取出版商的出版信息,以作为图书馆年度采购的参考。

3.3 中版通的理想

中版通公司是中国出版集团公司专门为完成中国可供书目数据库建设任务而成立的。最初,中版通将纸质书目、电子书目(网络书目)并重,模式也沿袭了传统的模式,从出版社那里营销书目,提供给馆配商和图书馆。为了扩大市

场份额,他们采取低价策略,但效果并不理想。首先是因为模式并无创新,出版社对电子书目和网络书目没有足够的兴趣。其次,其纸质书目的出版周期相对于社科两目来说还是比较滞后的,而且渠道比较窄,不为图书馆界所认可,出版社自然也不愿意多花钱重复去进行征订,哪怕价格很低。

应该说,中版通的第一个发展阶段是比较失败的。2006年,亚马逊网上书店推出了名为“Search Inside”的全新服务,实现了在线浏览全文样书,并能对样书进行全文检索。此举的目的在于提供给读者从网上购书的体验,帮助读者买到对路的书,利用全文检索新技术还可帮助读者了解图书内容,同时也是按章节销售的一个重要方法。另外也满足了那些想以POD和电子书方式购买图书的读者看样的需

要。

受此启发,中版通推出了“网上样书库”的新服务项目。项目要实现的效果是中版通公司以最快的速度、第一时间从出版社拿到样书或电子样书,经过技术处理后成为统一的电子样书,在中版通公司内部基于电子样书进行较详细的书目数据加工,经过校对后传输到网上发布。与此同时,同国家图书馆在网上协同操作数据资源与电子样书,国家图书馆在中版通公司数据的基础上,参照电子样书,对数据进行针对图书馆严格要求的补充与校对,从而编制出完全符合图书馆要求的MARC数据,在全国联合编目中心网站上发布,供全国图书馆使用。

目前,中版通的签约出版社有120余家,并且尝试为全国图书馆联合编目中心提供免费书目数据。

中版通免费从出版社那里拿来样书或电子样书,然后免费提供给联合编目中心使用,对上下游都免费。

2009年,新闻出版总署正式施行了书号网上实名申报制,一本书只有经过三审三校,才能够去申请书号。应该说,书号实名申报制,将有效提升CIP数据的质量,如果图书馆界能够很好地利用CIP数据,编目前移将成为可能。

OCLC在《从自发到自觉:美国图书馆经费支持研究》报告中说,研究固然重要,但行动则更为必须。总之,出版发行界、图书馆及其他文献信息部门应该和衷共济,共同构建一个集出版、采访、编目、流通一体化的文献资源共建共享和文献信息服务保障平台,为日后全面实现编目的共建共享奠定良好的基础。

参考文献

- [1] 姜火明. 图书馆编目将何去何从[N]. 图书馆报, 2010-06-11(6).
- [2] 廖永霞, 姚蓉. 平坦世界环境下全国联合编目工作之我见[C]// 第二届全国文献编目工作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0.
- [3] 唐武京, 钱京娅. 开放环境下图书馆编目工作的创新[J]. 上海高校图书馆情报工作研究, 2008(1).
- [4] 孙卫. 数字图书馆与知识产权: 进步与发展[J]. 数字图书馆论坛, 2010(3-4).
- [5] 方微, 凌丽君. 21世纪对图书馆编目工作的重新认识[C]// 第二届全国文献编目工作研讨会论文集.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 2010.
- [6] 老董少年. 二维码应用与中国在版书目网络建设[EB/OL]. [2010-10-10]. <http://blog.sina.com.cn/cyz1935>.

作者简介

赖雪梅 (1969-), 图书馆报总编辑, 中国图书馆学会学术研究委员会委员, 中国图书馆学会阅读推广委员会委员兼书目推荐委员会副主任。通讯地址: 北京市阜外北礼士路135号7号楼2层图书馆报编辑部 100037。E-mail: xhsmb@vip.163.com

Cross-border Cooperation in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Cataloging

Lai Xuemei / Library Weekly, Beijing, 100037

Abstract: The socialization of catalogue is making a great progress. To some extent, emphasizing professional catalogue is an excuse to refuse socialization. Professional catalogue is the groundwork, socialization is the purpose, they are complementary, and there is no conflict between them.

Keywords: Library, Press, Union Catalog, Cross catalogue, Sharing

(收稿日期: 2010-07-07)